

#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

■ 曹东勃

## “必也正名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他进而解释了背后的深刻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可见，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正名，正名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名分不正，则言说、进而事业推进不力，历史上诸多改革走向夭折甚至改革者自身身败名裂的事实足以说明，那种“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只能一时权宜，终究不可持续。改革事业不能推进，改革事功不得彰显，正向引导的激励机制就难以确立，反向惩戒的约束机制更无从谈起，民众只能手足无措。

站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解读孔子关于“正名”的论述，可以为我们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变革、历史性成就带来新的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坚持自我革命，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沿着文化自信的道路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也是通过回溯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里程碑式论断。

十余年前的一次讲座中，哲学家俞吾金先生曾引喻妙论文化自信。譬如一个人住在三楼，他每天从三楼下一楼、从一楼走回三楼，工作、生活，这条路走了数十年，习以为常，不觉有异。直到一天被人问及：从一楼到三楼有多少级台阶？他方才认真数了一下。俞先生这“多少级台阶”之问，不啻为醍醐灌顶的一声提示，引导行路的人们去回首来时路，去追念曾经的艰苦卓绝、苦难辉煌，去传承厚重的文化传统、内在精神，去凝练宝贵的成功经验。坚定文化自信，从对历史的叩问沉思中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并生成历史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历久弥新、生机勃勃的重要法宝，也是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一把钥匙。

## 返本开新：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现代，首先是一个具有浓厚时间韵味的概念，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分期意义。据著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的任务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奋斗征程，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不断熔铸、愈发坚定的历史进程。

名学者哈贝马斯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它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自从那时起，“现代”一词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用于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对立，在于前者是彻底面向未来的。

如果说17世纪是现代社会的起源，18世纪是现代化进程在西欧的扩散和西方核心地域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19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和经济自由主义风行背景下的现代化拓展，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它导致了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再评价，一种力图完善乃至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想象和尝试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替代性方案的代表。

传统的现代化模式有其无法摆脱的矛盾，也正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性的不断扩展，使得人们对现代性的描述越发显得“不够全面”，许多学者因而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多副面孔和多种表达。马克思早已洞察到现代性变动不居的特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不断遭遇资本逻辑之下传统现代化模式带来的同样巨大的风险挑战，折射了马克思在180余年前对现代化命运的深刻忧虑。

实现现代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谈到了“两个转变”：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即将全面执政的大国大党领袖的郑重宣誓，也是一个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使命的大国大党自觉承继1840年以来的历代仁人志士念兹在兹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使命梦想，立志坚定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并赋予

其新的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从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前后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到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定。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定。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定。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思想结晶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的精神支点，是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显著标识。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之中，则是由人口规模巨大这一自然元素出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妥善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而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新道路。

## 旧邦新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看法是，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经由媒介在不同客体之间相互传播，而文化则必须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方得以产生。

■ 郑长忠

# 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来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辛亥革命之后，现代政党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成为支撑文明转型和构建现代文明的领导力量。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那么，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动呢？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应该怎样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呢？本文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对此进行解读。

##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这就意味着，要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动，就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

## 党的自我革命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建文明的逻辑，决定了政党对文明发

展具有领导和推动作用，与之相适应，也要求政党必须根据文明发展的需要来推动自身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得以实现，需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得以支撑。

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有了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清障任务，与此同时也锻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组织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国家政权为主导而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党的组织为核心而构建了单位社会体制，克服了现代化建设对基础性积累和高度组织化的需求与当时中国的一穷二白和一盘散沙的特点之间的矛盾，完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阶段的任务，推动了政党自身建设从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向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决定因素，而党的建设是其中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法宝，只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有效引领社会革命。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并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陆续提出依法治国、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使作为现代文明主体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期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

对外传播见效于快意消费，快意消费实现于文化贸易，文化贸易的关键是消费者的自觉自主自愿购买。

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加快，在实物和版权贸易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影视、报刊、出版物等核心传媒文化产品的进展还不尽如人意。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传媒相比，“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华文化走出去受到一定影响。文化差异是影响传媒文化产品国际受众接受的关键因素，积极应对文化差异应做到：

## 熟谙影响传媒文化产品接受的文化差异维度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语言、历史与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四个维度，语言维度主要包括文字、声音、图像、体态等指标；历史与习惯维度包括历史事实、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经验等指标；思维方式维度包括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直线思维与循环思维等指标；价值观念维度包括隐私、成就实效、竞争创新、自由平等、年轻健康、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物质主义、时间导向、行动导向等指标。我们应从这四个维度入手，分析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由于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接受上的障碍，采取恰当策略，或减少或减轻或淡化或认可这些文化差异，实现我国文化产品为国际受众的最优化接受。

## 掌握文化差异影响传媒文化产品接受的机理形态

文化差异影响文化产品接受有其内在机理，具体表现为七种形态：新奇性趋近机理，指由于新奇性与陌生化，接受主体对其有一种求异性喜欢，形成一种感官层面的接受或感应性接受；陌生化排斥机理，指由于接受主体有自己的知识地图与认知图景，对陌生的东西有一种刻板印象式的排斥和结构性的拒绝；偏向性理解机理，指消费者在自己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偏离传媒产品的初衷；反向性误读机理，指消费者理解的意义与生产者赋予的意义正好相反，其赋予意义的出发点既可能是故意对抗，也可能是无意碰巧；认同性因应机理，指消费者完全按照编码者的支配意义去解码，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认可性兼容机理，指消费者在保持自己文化价值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给予他文化一定的存在空间，是一种兼容性的接受；思想场同构机理，指存在一个思想场，汇集了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思想以及产品蕴含的其他文化价值观念与思想，多向度地发生作用，形成异声同响的景观。

## 有效运用文化差异维度体系与影响机理理论最大化规避文化差异的消极影响

在生产环节，由于文化生产是一种精神性生产、符号性生产、意义性呈现，这就决定了传媒文化生产的自由性与灵活性，生产者可以运用各种符号进行无限的创意生产，对产品文化成分构成的控制也就成为可能，文化差异的最大化减少也就成为可能。减少文化差异的产制模式包括：“ABC”模式（即“香蕉人模式”，在产品的核心精髓上体现的是输出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产品的形式甚至内容上可以完全是东道国的文化血统与特征）；“混搭模式”（即根据不同国家传播要素、市场要素进行联结与组合，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纯通适文化模式”（即在传媒产品的生产中，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核心精神，其使用的素材全部是表现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本国文化元素）。

在消费环节，文化差异已固化在产品里面，减少它已是不可能，只有想方设法让消费者认可其文化价值观念。对外传播见效于快意消费，快意消费实现于文化贸易，文化贸易的关键是消费者的自觉自主自愿购买。购买的前提就是要获得消费者对我们文化产品的价值认可，实现价值认可的路径是文化间性、共通的文化意义空间和精神效用补偿。文化间性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旨归。其前提一是要彰显我国的文化主体地位，二是要正视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特质，三是要输出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精品，四是要激扬消费者的文化思索与变革。共通的文化意义空间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培养美欧受众的中国文化意义空间，一是要优化国际商业环境，保持和扩大美欧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二是要改善留学教育环境，培养更多来华留学生；三是放开医疗保健领域，容纳更多NGO组织；四是扶持视听产品输出，扩大汉文化素养教育，精神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文化产品中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程度。各民族文化对于本国而言是一种刚性需求，而对于他国而言，则是一种非刚性需求，国际传媒文化产品更多的是发挥精神效用补偿而非替代作用。一国民族文化体系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必须有某种力量对其进行缓冲与补偿。当该文化生态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补偿时，国外文化产品恰逢其时发挥这个补偿作用，非但不会对东道国民族文化造成冲击，反而会帮助它消除那些外部性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东道国消费者的精神福利。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财经大学基地教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研究员）

# 积极应对文化差异，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 刘建华